

李六如



海潮出版社



全国解放时期的李六如



李六如和夫人王美兰

留学日本时期的李六如



李六如和夫人王美兰在江西



忆六如老伯(代序)

李 锐

1939年平江惨案以后，湖南的形势日趋紧张，1940年开始大批撤退干部。记得我是1939年最后一天到达延安的。到延安后想到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去看望李六如老伯。

李六如是我父亲的好朋友，都是平江东乡人，我家长寿街离他家献钟只有三十里，他比我父亲大概要小五六岁。我父亲是1922年在长沙赋闲时去世的，那时我还不满五岁。母亲拒绝老家长辈的安排，决不回家乡去，艰难地带着三个幼小的儿女在长沙读书。母子孤苦伶仃，相依为命。由于母亲的经常唠叨，关于父亲的一生，他的为人、好尚和品德，包括他有哪些要好的朋友，都深深印在儿女的心中。这不仅是一种人伦的眷念，在那个世态炎凉的社会，更是一种傲于世俗、支持上进的无形力量。

父亲的朋友颇多，有些高官、名流我见到过，但母亲常谈到的六如和竹雅（方维夏，也是长寿街人），我却从来没有见到过。因为北伐战争前，他们早就到广东去了，大革命失败后，他们是被国民党通缉的著名的“共匪”、“暴徒”。母亲告诉我们，父亲去世时，他俩特别伤心；他们为人同父亲一样正派、耿直，都反对赵恒惕（1920年到1925年湖南的督军兼省长），都寄希望于广东出兵。父亲是1905年去日本留学

的，是同盟会员，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，到广东参加过孙中山的非常国会。六如和竹雅都是辛亥革命后去日本留学的，竹雅还是赵恒惕省议会的议员。平江这个地方，清末即得风气之先，“五四”运动时有过群众性的反日斗争，尤其十年内战时，是湘鄂赣根据地的中心区域，斗争极其尖锐而残酷。国民党高喊“血洗平江”，实施三光政策，烈士之多，居湖南首位。全县人口由七十多万减到开国初的四十多万。母亲告诉过我们，六如老伯家的房屋和器物都被烧光和抄没，两个胞弟和两个侄儿被国民党杀害，一个儿子下落不明。六如伯的元配夫人是母亲的同学，她们一直保持着友谊。

我去看望六如伯是有充分的精神准备的，而他突然见到这个外貌酷似乃父的故人之子，自然十分惊讶和意外高兴。至今我还记得那表情和满口乡音：“呵呀，呵呀，想不到，想不到，你的姆妈好吗？”第一次见面，谈得多的当然是我，关于我自己，以及他所关心的外面情况和故乡人事。在延安六年中，除开“抢救运动”那一年多外，每年总要去看望他一、二次。延安生活苦，每去必留餐，“打牙祭”。他种了苦瓜，有时还杀鸡，苦瓜、辣椒炒鸡，这是道地家乡菜。我在《解放日报》工作时，1942年要写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，特地去找他谈过他参加辛亥革命的事迹，对他的一生才有较多的了解。六如伯是我们党有数的几个老前辈之一，他怎样走上革命道路及其曲折的经历，在清末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中是非常典型的。难怪他后来非写出一部《六十年的变迁》不可。

**他曾力行“实业救国”，倡导平民
教育，最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**

六如伯的父亲是富商，他幼年丧父，资财被有权势的伯

父吞没。“骤贫难改旧家风”，母子靠借贷卖田维持家计。他虽然饱读经书，获得应县考的资格，但两个弟弟后来却只能当学徒了。1907年二十岁的时候，他结识了同乡凌容众。凌是同我父亲一道去日本留学的，也是父亲的好友，因为反对“取缔规则”，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。凌回来后即传播反清思想，办平江启明女校（我母亲就是该校师范部第一班的学生）。六如伯从凌那里知悉陈天华蹈海事件，并看到《民报》、《游学译编》、《嘉定屠城纪略》等反清报刊和书籍。从此，“报家仇”的愤恨转到清朝皇帝身上去了。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！”他抱着这样的决心，投笔从戎，1908年到武昌参加新军，结识了同盟会会员刘复基（武昌起义三烈士之一）、詹大悲等，组织文学社，为负责人之一，从事士兵运动。武昌首义时，他被黎元洪委为第四镇十六标标统（相当团长），参加了阳夏战争。由于不满意标统职位，又觉得自己年轻，想出洋深造，几经请求，黎元洪终于同意，赠他三千元出洋费，每月另拨官费八十元，还补了一个“陆军少将”头衔。六如伯用这笔钱买回了过去的几百石田产。到日本后，他放弃了“想当督军”的初愿，热心议会政治，做起“议员梦”来。于是不进士官学校，进了明治大学的政治经济系。后来一心读社会科学书，如《社会问题十讲》、《马克思经济学说》等，还读了《资本论》第一卷，特别受河上肇著作的影响很深。他说，这是他一生读书最多的一个时期。为了反对二十一条，还曾罢学回到湖南，做过宣传救国的工作。1919年10月毕业回国时，他的爱国思想中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东西，认为只有把全国占大多数的农民、工人教育起来，振兴实业，国家才有希望。这时正值“五四”运动兴起，他拒绝长沙官方的高薪聘请，回到平江，集资办了一个织布厂，用的是宜昌出产的

脚踏铁机。由于军阀勒索，洋布倾销，不久工厂就倒闭了，还欠了债，只好又卖田产。“实业救国”、“教育救国”的梦想终于破灭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他同时办的救贫工厂、工农夜校，以及农会、工会等，不仅使平江有了第一代产业工人，同时培养了平江最早的一代革命干部。我在延安时，还找吴创国老人谈过这些事。吴是平江人，裁缝出身，当年就参加了办工农夜校和组织工会等活动，是六如伯得力的助手。

1920年8月，经济破产了，六如伯到长沙法政专科等校教书，但不甘于当个教书匠，于是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到处演讲，倡导平民教育运动。他通过省政府、省议会和省教育会中许多朋友、熟人的关系，自上而下向各县推动，成立了全省平民教育促进会，被举为副董事长（董事长为赵恒惕省府的秘书长）。方维夏时任省教育会会长，给的帮助最多。通过平民教育运动，还推动四五十个县办了县报，全省县报联合会由他任会长。在长沙城区，由工厂、基督教青年会等办的工人夜校达一百多处。

他还编了四本通俗的《平民读本》，于1922年出版，其中宣传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。这四本小书曾风行一时，一连印了四版，达几万册。他同我谈起这些往事时，说自己当初并没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意识。

1920年到1921年的平民教育运动，是有影响的进步活动，自然受到毛泽东的注意，便派人与六如伯联系，他们一见如故。结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原新民学会中的骨干何叔衡、李维汉、夏曦、郭亮等。以后，六如伯所有的社会活动也就同团与党的活动结合起来，如1921年春，平江就办起了文化书社的分社。李立三到安源开辟工人运动，就是利用平民教育会的合法身份。由毛泽东、何叔衡介绍，1921年六如伯先入

团，随后入党，那时叫做由“中学”升入“大学”，党对团是很秘密的。入党之后，六如伯任湘区（省委）文委委员，同时负责平江的建党工作。在建党初期，六如伯同毛泽东的关系是很密切的。他的元配夫人跟我的母亲话旧时就谈起过：毛泽东常来我们家，我给他洗、补长褂子都记不清回数了。

他是点燃平江“星星之火”的第一个 火种，平江可歌可泣的斗争值得史家一书。

对平江来说，李六如是“星星之火”的第一个火种。1922年他发展了两个党员，一个是工会会长陈苇章（1928年被国民党杀害），一个是农会会长余贲民。他们两人由六如伯介绍同毛泽东见面，余贲民参加过辛亥革命，是湖南新军的连长，武昌起义战役中负伤后，即回乡务农。“五四”运动时在启明女校任教。后来是毛主席率部上井冈山时主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，也是湘鄂赣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，1932年任湘鄂赣省委的军事部长。1933年负伤治疗时，受到错误的肃反政策的干扰，在关押中去世。六如伯专门写过《余贲民传略》。据许多老同志回忆，毛主席在长征路上，在延安，在北京中南海，多次谈到余贲民，赞扬他的忠诚和苦干精神。

1923年平江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支部，党员中有裁缝、木匠、中医和小学教员。1924年，有团员二十三人。平江人前往黄埔军校学习的，一至四期有三十二人，五至七期有五十五人。这年由共产党员为主建立的平江国民党，有党员一百多人。献钟党支部书记罗纳川（1928年牺牲，时为县委负责人）领导二千造纸工人罢工，取得胜利。1925年，党员发展到三、四十人，正式成立县委。在北伐战争前夕，平江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群众运动。

由于党的经费奇绌，1923年，省委（湘区区委）派六如伯作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代表赴广州，向国民党中央求援。先由叶楚伦、邵力子等帮助了一笔款子，后来又由廖仲恺等批准，每月接济湖南一千元。六如伯又找到谭延闿和湘籍军官鲁涤平、陈嘉佑、张辉瓒等，为党办的湘江学校募了一大笔款子。由于谭延闿等以为六如伯是十足道地的国民党员，坚决挽留。经过党的同意，他受任湘军国民党特别党部常务委员。谭延闿任第一次北伐总司令时，六如伯被任为总部党政处长，在韶关行营拜见孙中山。六如伯留下的笔记这样记载了这次会见：“孙中山询问了湖南的情形，我报告了夏曦在湖南发展国民党党务的概况。他赞许说：还是共产党行，肯干，三大政策是对的嘛。不联他们联谁？又说：辛亥革命到现在十三年啦，政权操在反革命手里，越来越腐败黑暗。”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回到广州，六如伯任第二军校政治部主任。他在湘军中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便是方维夏。以后在各个团也发展了党员，成立了特别支部，他任书记，由周恩来直接领导。第二次北伐时，他任第二军（军长谭延闿）第四师的中将党代表（师长为张辉瓒），方维夏为谭道源师的党代表，军党代表是李富春。在北伐战争中，六如伯随部队在前线，经历了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湖北各次战役。第二次攻南昌时，他在前线督战几天几夜。

平江是通湖北的要道。1926年7月，北伐军进逼时，党领导的民团成立了敢死队，余贻民任县团防局的总局长。1927年，党员达七千多人。“马日事变”后，湖南城乡一片白色恐怖。七月，县委集合团防局、工农武装共一千二百人编为平江工农义勇队，由余贻民任大队长。余部奉命前往南昌参加起义。后来这支部队辗转战斗，到浏阳文家市与毛泽东会合。

大革命失败后，1927年8月，党派六如伯和夏明翰到平江，领导秋收暴动。六如伯带回去两支枪，在猷钟找到罗纳川，一共“三支半枪”（有一支打不响），于9月21日袭击猷钟警察所，获枪四支，镇压反动警官等八人。这以后，县委成立了平江暴动委员会，由罗纳川任主任，开始在四乡领导对付反革命屠杀的武装暴动，成立义勇队。各乡义勇队的人数几十、几百、上千不等，枪支多不过几支、几十支，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发展起来。9月，暴动委员会还组织几百农民扑城一次。这些初出茅庐的游击队，同国民党的清乡部队进行了极为艰苦而残酷的斗争。由于形势的恶化，全县党员由七千人减到三千七百人。1928年，国民党派三个团来平江清剿。3月，县游击总队组织十万农军第二次扑城，因人数太多，过早暴露目标而撤退。这次扑城高潮时，党员又发展到一万一千多人。

这时平江的豪绅纷纷向国民党政府呈文控告，说李六如是平江的祸根，必须翦除。于是这个“祸根”被悬赏通缉。由于目标太大，组织决定六如伯离开平江前往上海。这是1928年初的事。从此直到全国解放，他就再没有回到平江去过了。

由李六如点燃火种的平江革命斗争，确实是可歌可泣、惊天动地的，值得史家一书。十年内战时期，平江这个地方高潮低潮，汹涌来去；胜利失败，交织起伏；迅猛的发展，惨重的牺牲，常常更迭而至。1928年4月，东乡至南乡，火延八十里。陈光中部在东乡，分配士兵杀人任务，每天交左耳一只。7月彭德怀起义后，有的村子，群众集体入党，全县党员一时号称几万。8月陈光中清乡，三天内在龙门杀一千三百余人，为有名的“龙门惨案”。几个月之内，东南北三

乡，火光不熄，几万人无家可归。

但革命种子是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的。到1930年5、6月份，平江的党、团员又发展到一万一千余人。1931年3月，红军攻克县城后，在这里选志愿兵一千五百人到江西补充红军。1938年，新四军第一支队成立时，傅秋涛率领的第一团，从平江出发，共一千一百人，有二百多支枪，七百马刀。平江同中国革命的关系，从这样一个数字也可见一斑：1985年平江县的负责人到北京来找平江的老干部座谈，军以上的还有七十人。

**在延安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，他感慨
较多，对自己一生思想发展作了剖析。**

六如伯于1928年被迫离开平江到上海后，住在友人家中，险遭逮捕。这年冬天，党中央派他到南洋工作。1929年在新加坡办了一张小报，被英政府查封，人也被捕。他在法庭辩论，因无证据与口供，勒令出境。党又派他到橡胶园做工人工作，办工人夜校，同工人同餐、同宿、同割胶。由于患病，后来回到香港。在南方局工作一年多，于1930年进入苏区。先在闽西省政府任秘书长，掌管内务、财政二部。后来调中央苏区，任税务局长，国家银行代行长等职。中央苏区经过几次反围剿战争，部队扩大，税收不足，加以制度紊乱，财政异常困难。六如伯以自己的专长，主张略微提高土地税，增发货币，整理税务，建立国家金库，度过难关。当时的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采纳了他的建议。苏区人民生活最大的困难是缺盐。他发动一些老盐行挖土熬盐外，还贷款给商人，组织他们到白区千方百计运回食盐和药品、布匹等急需物资，他自己同营业部人员一起站柜台。可是在王明“左”倾路线

统治时期，象六如伯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，当然容易得咎。在延安整风学习时，他曾同我谈到过，邓子恢被指责为“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”，六如伯自己虽未明受处分，但也受到“商人路线”、“机会主义”、“阶级意识模糊”这类批评。当时传言银行系统“被右倾机会主义所统治”。他也收到过关心他的同志的劝告信。谈到这些往事他很感慨，在江西时，许多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没有参加过，两次全苏代表大会都没能参加。他认为他之没能参加长征，也类似何叔衡等一样，是被认为“右倾”所致。何叔衡同他分手时，流着泪说下这句话：“唉，六如，不料我这副老骨头还要送到白区去啊！”

中央红军长征后，六如伯被留在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，仍主管财经工作。根据地一下变成游击区，经常随着部队在赣南山林间转移，栉风沐雨，夜行日宿。由于身体与年龄关系，经常掉队。1935年在一次非常危急的情况下，他被认为是再拖下去，会白白送死当俘虏，于是项英命令他和他的夫人王美兰离开苏区，给了一笔路费。这笔钱在过赣江时，几乎全部被白军搜走。流落到吉安后被捕。后来经覃振援救，才得释放。1937年8月到达延安。

1944年夏天，我害了一场严重的伤寒病，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。病愈后去看望六如伯。他谈到对整风、“抢救”中某些人的过左做法，他向组织提过书面意见。他还告诉我，“抢救”期间，保安处曾派人来向他调查我老家的情况，还问我的父亲是不是红军杀掉的。我是在长沙读的小学和中学；老家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六如伯比我熟悉得多；老家的亲属中，有人死于国民党的屠刀，也有些妇孺死于过左政策。有他的证明，这类谣传一下澄清。其实，我进延安时写的《自

传》，老家的重要人事，是写得清清楚楚的。奇怪的是，1959年庐山会议上我受批斗时，康生仍在造谣，说我个人“有杀父之仇”。后来知道，六如伯向调查者再一次辟这个谣，并对我父亲作了评介：是当年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开明人士，如果活下来，也许会赞成共产主义的。这样的话，抗战前我也听母亲说过。

日本投降前不久，在延安时最后一次看望六如伯，他感慨较多，对自己一生的思想发展作了剖析。他说辛亥革命前，是狭隘的民族爱国主义思想，先受康梁影响，后受同盟会影响。在日本留学时，先倾向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，读过各种社会主义书籍后，认为共产主义虽好，恐难实现，倾向改良的欧文主义。自己不尚空谈，较重实践，因此回国后在平江搞了那些活动。办工厂失败，到长沙教书后，感到国内军阀横行，农村经济破产，觉得非走苏俄劳农政府的革命道路不行。虽然那么早就入了党，但对共产主义和党只有抽象的认识，对党各个时期的任务和如何才能走向共产主义等许多问题，长时期中是很模糊的，认为只要把工农群众组织起来了，到处罢工暴动，就可以夺取政权，实行社会主义，而不懂得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，更不懂得每一时期要有每一时期的革命政策和具体措施。他说，参加整风，学习党史，检查历史，参加新哲学会及其他各种学习，学习了毛主席的许多著作，尤其是有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亲身感受，思想认识上才真正有所提高，同过去相比，可说有质的不同。

1944年3月，在杨家岭学习会上，关于苏区的土地问题，六如伯作过一个很好的报告，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。他说，十年土地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期：八七会议到1931年四中全会前三年多，是探索时期；四中全会到1935年底五年，

是土地政策上变更最大，而在各苏区发生问题最多的时期；中央到陕北后，发布《关于富农策略决定》到抗战前夕，是开始转变土地政策的时期。他提出中国农村有否发展资本主义可能的问题。关于中国土地所有制，六大决议认为中国土地大半可以买卖，这便是资产阶级式占优势。他认为这是根本的错误。秦朝以后土地可以买卖，不能据此就说中国是非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优势，此外，还提出土地国有有还是农有？中国是大地主多还是小地主多？中国富农是小地主、半地主性，还是农村资产阶级？等等问题。当时我在《解放日报》管评论工作，接触过这些问题。六如伯是重视理论尤其经济理论的，1947年兼职主持东北财经干部学校时，还主编过《实用经济六讲》一书，第一讲“财政经济总论”就是他执笔的。

日本投降后，我们先后到达承德。我负责报社工作，六如伯是热河省委常委和省府秘书长。见面时感到他有一种极为兴奋的情绪，即中国革命的胜利确确实实在望了。1946年纪念“七七”抗战九周年时，我请他写过一篇文章：《蒋介石怎样出卖东北与热河》，内容是“九·一八”到“七七”的六年大事记。这些历史事实真相，是新解放区人民迫切需要了解的。

皓首病躯，日夜伏案，开始了一生最后的战斗——创作三卷巨著《六十年的变迁》。

1952年初，六如伯回到阔别二十五年的家乡。当时我在湖南省委工作。我的母亲自己做菜，举行家宴，请六如伯吃饭。陪客有两位平江人：长沙市委书记曹瑛和民政厅长陈再励，他们都是六如伯的老战友；还有一位同乡旧友陈长簇，是父亲的留日同学，旧时多年任湖南高等法院院长，支持程

潜起义的。席间话旧，极尽欢愉，意境颇近于王荆公句“草草杯盘供笑语，昏昏灯火话平生”。（长沙当时电力虽不足，电灯还是很明亮的，“昏昏”易“昭昭”更切合当时情景。）这时我正为《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》一书搜集资料，他知道我的这个计划后，谈到他在延安整风时，由于思想认识的提高，发现自己一生同中国革命历程，竟是如此紧密相连，因此写了《自传》之后，就将自己各个时期的经历和认识，写了许多札记，这个包包在离开延安后，一直随身带着。他说这次到湖南来，也附带收集有关资料。六如伯为我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。但是他很少谈自己，如关于平民教育运动中他所起的作用，避而不言，以至书中有关此事的年限我推后到1922年。他是湘区的首任文委委员，也没有谈及。介绍陈蕃章、余贲民二人来长沙这类事，才讲得比较具体。四本《平民读本》也是这次借给我的。这四本书的内容，在我写的书中作了较充分的介绍：写法由浅入深，由短而长，文字通俗，每课由几十字到三四百字不等；内容包括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问题、社会文化、科学知识和国内国际大事，介绍了各派社会主义，尤其着重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向。

五十年代在北京，整天忙于事务，看望六如伯反不如在延安的次数多了。《六十年的变迁》第一卷出版之后，他在扉页题签，送了一本与我，我至今保存着。当时虽没有细读，其中人事、乡情、风俗，却多么熟悉。凌雍雄（凌容众）在甲山办启明女学堂，最初招来的五名学生中，有“姓李的媳妇”，岂不就是指我母亲？大跃进那两年特别忙，似没有再去看望过六如伯，对《变迁》一书有什么想法自然也没有谈过。回忆中只有这样的感想：三卷书怕完不成。六如伯身体

瘦弱，写完第一卷已是古稀之年了。这本书出版之前，曾将打印稿本送与一些老同志审阅。他告诉我，彭老总特来看望他，对此事倍加赞赏。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六如伯。1979年初回到北京，去看望黄克诚同志，才知道这十年中，加上六如伯，我们三个人归“专案一办”同一个人管。1980年7月2日举行六如伯的追悼会时，我正在南方出差。一直到前不久，才听说王美兰夫人仍住在北池子故居，自己也有了握管的时间，于是去看望她。二十多年睽违，彼此还能认得出来。我们谈了大半个上午，才知道六如伯去世前的情况。她知道我要写这篇文章，将手头有关资料都交给了我，还送我《变迁》的第二卷和未完成的第三卷。同时我也收到平江寄来的有关六如伯的材料。

六如伯曲折、光辉的一生，前面只叙述了一个轮廓。他的经历如此丰富：武昌起义，北伐跨党，白区红区，国内国外，军事、政治、财经、文化、教育、司法各种工作，翩翩公子与共产党员，北伐将军与割胶工人，灯红酒绿与枪林弹雨，三次坐牢，经受酷刑……波澜起伏、艰难险阻集于一身。六十年的中国革命与个人经历，其追求、探索，理想、实践，后退、前进，挫折、胜利，失败、成功，两者溶为一体，如形影之相随，中国革命的惊涛骇浪中有他这一片耀眼的水花。五十年代中期，他由于年事与身体而离开工作岗位，虽然得的是脑病，但脑子却平静不下来，皓首病躯，日夜伏案，开始了一生最后的一场战斗——创作三卷《六十年的变迁》。夫人说：“深夜，‘铁马冰河’的回忆，会使他披衣下床，欣然命笔。为了核对某一史实，他要翻阅大量资料、书籍。有时为选择一个恰当的词，他会在院子里走上几十个来回，反复比较推敲。1961年，他更不顾自己年迈多病，竟长途跋涉，

先后走了三个省，行程数千里，为第三卷收集资料。当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时，他总说：‘怕时间不够用！’他无时不意识到必须为自己有限的余生争分夺秒。‘不完成《六十年的变迁》我死不瞑目’。”（《李六如和《六十年的变迁》》，《战地》1980年第6期）

六如伯在衰弱的晚年如此执着于此书的完成，他必是有满肚子话要说，他要把自己六十年间的立身行事、是非功过，都展现人前；要把六十年中国的变迁，从他个人经历这个侧面留与后人知晓。我想，他在回顾自己一生经历的时候，必定是有些宽慰，有些追悔，有些庆幸，有些惋惜，也有些遗憾甚或委屈。这虽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，但虚构的成份是很少很少的。主人公李六如在书中是变成季交恕了，可是众多的人名、地名都是真实的，许多情节几乎是按照历史事件的原貌描述的。在一定的意义上，小说就是历史，难道《红楼梦》不也是历史吗？记得恩格斯说过，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所给予他的关于法国历史的知识，甚至比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著作还要多些。我的理解是：《人间喜剧》对当时法国的动荡形势、社会风尚、人事纠葛、人们心理状态的栩栩如生的描写，为我们具体了解那一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，这是以诉诸理智的科学概括为主要叙述方法的历史著作无法提供的。当然，《变迁》就艺术性而论，不可以同《人间喜剧》比肩，但其中确实提供了大量中国革命史的感性资料，我甚至认为直接把它看作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无不可。从反映时代来说，作家也应该是历史家，必须自身有丰富的生活经验、渊博的知识和生花妙笔，才能叙述确切，有血有肉，引人入胜。六如伯正是具备了这些条件，才决心最后当“作家”的（我这里加引号，是他曾对我说过：“我怎能算作家”，他认为《变迁》结构上，艺术上都很差），才能使《变迁》出版后